

“公务接待新规”还需听其言观其行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其中规定,公务招待不得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规定》指出,住宿用房以标准间为主,接待省部级干部可以安排普通套间。(12月9日《新京报》)

临近年底,也是各种公务接待的活跃期,以往甚至有突击消费的荒唐闹剧。至十八大以来的劲吹新风,着实是把公务接待这面里的混沌扬清了一番。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出台,也给某些心存侥幸的官员再次树立了高压线。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是我们这段时间听到最多的风气词汇。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很多地方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毕竟这样的顶层设计带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上面带头率先垂范,下面也定然是紧随其后。然而就公务接待这个领域来说,虽然力度堪称犁庭扫穴,但是远远未到收官阶段。

前段时间落马官员又给我们上演这样的浮世绘: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长期在酒店豪华套房办公、原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也上演着矿泉水瓶装五粮液的小聪明、原江西人大副主任陈安众只喝5000元以上的洋酒……这些都是最近贪官爆出来的轶闻,而

那些没浮出水面的,我们也就不待而知。

这些官员并非不知道公务接待的条条框框,但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说压根就没把公务接待放在眼里。除了中央和省的检查组空降之外,平时市一级的作风办还能拿自己咋样?级别低的监督级别高的,远的监督近的,想想看也觉得不可行。所以说公务接待并非条例少,而是执行起来实在是有点尴尬。

《规定》中有这么一条“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然而我们要问为何还要留出中低档酒的空间出来?公务接待并非游玩性质,而是有行政议事的安排,如果这个时候桌面上还有酒瓶子,

这办事的效率多少要带点晕乎乎吧?

也许这一条是延续“中国国情”吧,历来就有无酒不成宴之说。公帑之用来负责公务接待的饭菜这无可厚非,但绝没有义务负责“来两瓶”吧,万一喝高了大喊一声“走一个”,岂不闹笑话?看看广州明星政协委员曾志伟感叹开会吃不饱,就应该知道所言并非矫情。

不管怎样,《规定》的出台,将把年底到春节这段时间的公务接待口子扎得紧紧的,是一个值得百姓叫好的政策。有感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盛行,所以我们是报以“听其言观其行”的观望态度。(谢伟锋)

特权思维猛于“霾”

12月4日,南京发布空气质量红色预警。南京市城管局环卫处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知各区环卫公司购置专业防霾口罩。但有人反映,看到在户外劳作的环卫工人,并没有戴上专业的防霾口罩。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河西建环环卫建设公司只给管理干部采购专业防霾口罩,却给环卫工人配普通纱布口罩。

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为什么坐办公室的管理干部可以领到防霾口罩,而一线环卫工人却没有同等待遇?对此,环卫所先后给出两种解释:其一,因为连夜采购,很多药店当晚都卖断货了,只购到了少量防霾口罩,而环卫工人太多,所以只好留给办公室的管理干部;其二,区别对待是个误会。

究竟是怎么“误会”的?环卫所未能解释明白。其实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尽管一线工人更迫切需要防霾口罩,但在管理层看来,理应先把自己的健康保障起来。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权思维,在这种思维指导下,曾经的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被抛到九霄云外。相反,当面临着评优树先、发放稀缺物品时,某些领导干部总是不由自主地冲到了前面,尽管有时对所争到的东西未必很需要。譬如,在办公室总还不至于戴防霾口罩吧?

雾霾很可怕,特权思维更可怕。相对于伤害环境生态的雾霾,特权思维伤害的却是社会政治生态。此类现象一旦出现,有关部门应及时责令改正,防止不正之风合法化。(辛木)

新闻:浙江省温州港集团被指自2006年起连续以津补贴、加班费等名目,为温州乐清市北白象镇政府拆迁领导小组发放工资,共计239万余元。该集团一项目的用地和拆迁安置与所在地北白象镇政府工作联系紧密。(12月9日《中国青年报》)

虽然温州港集团贵为国有企业,怎奈在人家地头,工程建设要当地政府配合,如果不孝敬孝敬,地方干部难得有服务的积极性,于是做了点实事少不了要慰劳,而且节假日还要慰问,这些都是要花银子的。

为企业服务本是分内之事,这些官员在公共资金里拿俸禄,为公众服务,又在企业里领“工资”,为企业“工作”,到底是政府的职员,还是企业的雇员已经模糊不清了。人们看到的是,只要来钱,管什么身份扭曲、变异。

“服务”必须额外酬报,一些基层政府看来已经底线失守。国企尚且要烧香祈求恩典,那些民营企业、普通百姓经商办点事,该是怎样疲于应付?

文/李建华 图/李宏宇



母亲杀儿谁该疼痛

河南省鹿邑县46岁的村妇武文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审。去年2月,她把农药瓶递给瘫痪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对这起案件,全村人对外统一保持沉默。可武文英并没解脱,10个多月后,她选择了自首。为此,3000位村民为其求情轻判。

毒杀瘫痪双胞胎的武文英不是第一个。2011年,东莞妈妈韩群凤就因溺死双胞胎脑瘫儿子而获刑5年。韩群凤一案,当年也曾引发舆论轰动,逾千人签字为其向法官求情。

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总想问一句,我们的社会保障、慈善救助去哪儿了?

为了让儿子们活下去,武文英曾四处求助。10多年前,家人找过村委两回,可谁也不管;由于信息闭塞,他们也失去了获得残疾人救助的机会;最后求助媒体,出现了短暂转机,但获得社会捐助是杯水车薪。

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脑瘫儿童总数接近500万名,并以每年约4万名的速度递增。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500多万母亲

在独自忍受着与武文英类似的痛苦。

看看国外的情况:美国在1975年出台了《教育全体残障儿童法案》,对不同残障标准的儿童进行专项救助。英国16岁以下残障儿童家庭申请儿童个人护理资金、节假日期间的短期替换照顾和通宵照顾等。如果说,武文英每周都有人代替她照看一下孩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崩溃。

无论如何,母亲杀儿,政府和社会都应当感到疼痛。(陈小二)

往局长座驾疯狂扔钱,折射了什么

本该层层把关的监管人员,却把违建当“摇钱树”,充当“保护伞”。海口市纪检监察部门最近通报8起违建领域中的腐败案例,在该市掀起的“拆违风暴”中,海口所辖的4个区中3个区的城管局长和城管执法队长因收受贿赂而落马。在海口美兰区原城管局长李温强的辖区,有居民表示,李温强一旦驾临美苑路和美景路路段,就会有人向其车内扔钱,非常疯狂。(12月9日《新快报》)

不是居民太疯狂,实在是局长太“牛”了,只要美兰区城管局

长李温强一驾临,美苑路和美景路的违建居民就成了没“王”的蜂,一窝蜂地向局长车上扔钱。一番番人民币从天而降,雪片般落入局长座驾之中,这等场面是何等的壮观,想来都让人眼馋。

不过,这惊人现象的背后,并不是李局长为居民办好事受奖励,也并非居民出于自发自愿的行为,实是慑于他的淫威。因为在美兰区所有违章建筑拆与不拆,都是由他说了算,堂堂的城管局长俨然成了黑社会的“老大”,其做派是典型的“我的地盘我做

主”,在这种情况下,违建居民只能乖乖地向其车内“扔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平日里城管局长秉公执法,违建居民丝毫嗅不到局长滥用权力的任何信息,也不会产生扔钱的冲动。除非是脑子进水。海口所辖的4个区中有3个区的城管局长和城管执法队长因收受贿赂而落马,确实令人深思。美兰区两任城管局长“前腐后继”的新闻更是让人震惊。这一现象足以说明,海口城管领域已经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如果在相关监管上还是牛栏

关猫,不把城管局长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李温强之后,可能还有“张温强”“王温强”再现。

正是由于城管局长的权力不受约束,金钱才会从天而降。治理城管局长一驾临,就有人向其车内疯狂扔钱的怪象还得从规范权力运行做起,给权力加“箍”,使其公开透明运作。如果违章建筑的拆与不拆,是制度说了算,而不再是城管局长说了算,那么,有人疯狂扔钱的闹剧自然就不会再上演。(郭双年)

@ 一语惊人 @

“你们不要命了,我要命啊!背自己的净化器,让别人说吧”
——上海大妈背空气净化器买菜。

出处:中国青年网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在郑州街头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
——网友如此吐槽持续的雾霾。

出处:《河南商报》
“闲着没事就想到打报警电话打发时间”
——重庆男子为寻刺激21次报假警,被抓后称电话内容都是从游戏里获得的“灵感”。

出处:《检察日报》
“我觉得每天时间都很紧张,浪费在跟人争吵上很可惜”
——西安老太两次被撞自掏4000多元治伤,称不想磨嘴皮子浪费时间。

出处:《华商报》
“我就是想看看公交车是否会让我,如果撞到的话还可以要点医药费”
——南京男子跑上斑马线与公交车相撞被拘。

出处:《南京日报》
“我每天晚上都会抱着妈妈的照片睡觉”
——湖南一留守儿童回忆爸妈在身边的日子。

出处:《长沙晚报》
“好好的儿子,硬是被赌博机毁了”
——武汉名校毕业生沉溺赌博,扬言卖肾威胁父母汇钱,老人痛心疾首。

出处:荆楚网 (木桦 辑)

底线保障

不应被“新闻化”和“标杆化”

备受关注的“井底人”王秀青,已在某高校找到工作月薪3000至4000元,包食宿。

据报,京郊人王秀青,因家庭困难,在丽都饭店附近帮人洗车,为节省开销才找到井底居住。

王秀青很幸运,从“井底人”瞬间变成了月薪三四千的人,而且几天来一直有好心人来送钱送物,乡镇和村里也关注到了他,让他提交申请低保的手续,对他来说,苦日子终于结束了。从新闻报道王秀青家的细节来看,他的家庭情况及境遇困难并非绝无仅有。平心而论,像他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甚至有许多人的困难比他还要大很多。王秀青生活的瞬间变化,并不是因为他的困难的特殊性,而是因为“井底人”这种抓人耳目令人猎奇的生活状态,被媒体曝光。

他的幸运之处仅在于,于困难群体之中,得到了意外的关注,而他的幸运则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不是社会保障机制带来的必然结果。

照理,街道办事处是社会保障机制终端的末梢神经,但如不是媒体报道,街道办还不知道“井底人”。在社会保障机制这条底线之内,“及时雨”变成了“马后炮”,相关部门这样的被动,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王秀青的不幸,除了生活的不幸,还有命运的不幸。即他们生活的“不幸”,必须要有某种“新闻性”做药引,否则,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困难也就得不到解决。

社会保障的意义在于最后这条底线的普世性价值,它针对的是底线上的所有困难家庭,社会保障是这些家庭共同的网底才对,“新闻化”和标杆化会使底线应有的意义大打折扣。而且对于一些困难家庭而言,也会从心理上产生“争取”亮点的趋向,而这样的“争取”客观上也会造成一种“厚此薄彼”的不公平状态。(马进彪)